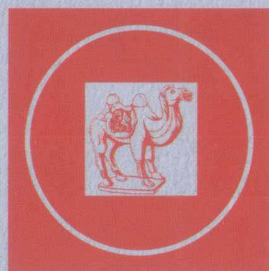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

陈支平 主编

15—18世纪的徽州 典当商人

郑小娟 周宇 著



陈支平 主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

15—18 世纪的 徽州典当商人

郑小娟 周 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5~18世纪的徽州典当商人 / 郑小娟, 周宇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1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 / 陈支平主编)
ISBN 978-7-80696-767-6

I. ①1… II. ①郑… ②周… III. ①典当业—经济史
—研究—徽州地区 IV. ①F8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7149号

15~18世纪的徽州典当商人

郑小娟 周宇/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30千字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767-6

定 价: 27.00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支平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为了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探索精神,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2005 年,我受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委托,组织出版了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共 20 种。丛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同仁的好评和鼓励，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建议，增强了我继续组织出版丛书的意愿和信心。恰逢此时，天津古籍出版社愿意为丛书的继续出版挑起重任，于是地利人和，这套崭新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就这样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希望通过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更广泛地开拓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更紧密地团结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学人，更加多样性地凝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打破以往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那种较为封闭的格局，使之逐步成为带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们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这一探索几乎是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同时进行的。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域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其学术意趣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由于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和国外学界缺少应有的交流，因此与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显得沉寂。如今，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显露出应有的互动与影响力。

这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的责任与光荣，让我们热切地期盼着它的成长和壮大吧！

目录

序 / 1

绪 论 / 1

- 一、徽州典商研究回顾 / 2
- 二、本书的基本框架 / 6

第一章 徽商的兴起及其热衷于治典的原因分析 / 10

第一节 关于徽商的兴起 / 10

- 一、徽商兴起的动因之一：古徽州的自然地理条件 / 11
- 二、徽商兴起的动因之二：古徽州的社会人文条件 / 17
- 三、关于徽商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 18

第二节 徽商热衷于治典的原因分析 / 25

- 一、徽州本土衣食匮乏导致当地人寄命于钱 / 25
- 二、商人资本在徽州本土难以“用本守之” / 29
- 三、徽典兴起源自于典当业方面的因素和相应的历史环境 / 33

第二章 透视徽商在典当经营业上的成功 / 42

第一节 宗族关系网络对徽典发展壮大的影响 / 43

一、以严密宗族关系网络而著称的徽州社会 / 43

二、宗族关系网络对徽典发展的支持 / 47

三、典商来源地和经营家族的相对集中化 / 51

第二节 对明清时期徽典之“盛”的分析 / 57

一、关于徽典之“盛”的主要史实 / 57

二、对徽典之“盛”的理解 / 61

第三节 徽州典商的“准集约连锁化”经营方式 / 66

一、传统与现代典当业的异同概说 / 66

二、现代典当企业普遍以集约连锁化作为做大做强之路 / 69

三、徽州典商的“准集约连锁化”经营方式 / 71

第三章 徽州典商例说

——以休宁西门汪氏、婺源三田李氏、歙县许氏等
族中的典商为范例 / 77

第一节 休宁西门汪氏宗族中的典商例说 / 77

一、汪福光和汪一麟伯侄 / 78

二、汪狮、汪新、汪应时 / 81

三、汪岩福 / 85

四、汪应亨、汪起前、汪起凤、汪可铭、汪可钦 / 86

五、汪可训 / 90

六、汪栋 / 93

第二节 婺源三田李氏宗族中的典商例说 / 94

一、李贤 / 95

二、李大祈 / 96

三、李良朋 / 98

四、李大嵩 / 99

五、李大鸿 / 100

六、李廷芳 / 102

第三节 歙县许氏宗族中的典商例说 / 102

一、许太明 / 103

二、许秩 / 104

三、许尚质 / 106

四、许世积 / 108

五、许挺、许文才、许金 / 109

六、许明大、许天志、许侣山 / 112

第四节 休宁程氏、歙县潘氏、吴氏宗族中的典商例说 / 113

一、程锁 / 114

二、潘仕 / 117

三、吴骏 / 119

第四章 静态分析:徽商发展过程中典商所起的作用 / 122

第一节 徽典的次生性质与首要的“蓄水”功能 / 122

一、典当经营在徽商经营诸业中属次生性行业 / 122

二、“蓄水”是典当业作为徽商次生性行业的首要功能 / 124

第二节 透视高利贷阴影下的徽典营利问题 / 128

一、徽典营利的两个观察点:资本增值率和营利的方式 / 128

二、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徽典资本的“高利盘剥”问题 / 131

三、徽典营利对于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直接意义 / 141

第三节 徽典对徽商发展所起的“反哺”和“培土”的作用 / 143

一、徽典对于徽商发展的“反哺”作用 / 144

二、徽典“培土”以助徽商发展 / 146

第四节 徽典成为徽州商帮发展扩张的“信息终端” / 149

一、从徽典兼营其他行业的现象谈起 / 149

二、徽典对于徽商的经营发展起到了“信息终端”的作用 / 151

第五章 动态观察:明清时期徽典的总体发展趋势以及影响 / 155

第一节 明清间徽典的总体发展趋势 / 155

一、明中后期徽典的总体发展趋势 / 155

二、清代徽典的总体发展趋势 / 161

第二节 明清徽典对徽商儒商化的影响 / 169

一、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多角度的“贾儒合一”实践 / 170

二、明清徽典“贾儒合一”对徽商儒商化色彩的深化 / 176

第三节 明清徽典在徽商官商化问题上的作用 / 188

一、徽商在典业之外其他行业扮演的官商角色 / 189

二、徽典在明清徽商官商化问题上产生的作用 / 194

第六章 徽典资本的传承方式及其对徽商发展的意义 / 202

第一节 关于徽典向后人传授典当资本的方式

——立足于《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的观察 / 203

一、崇祯二年程虚宇析分典当资本当为尝试性分业 / 203

二、程虚宇之父在传承典当资本时的分阶段性 / 206

三、程虚宇家族采取尝试性、分阶段传授典当资本方式的原因 / 208

四、崇祯二年的尝试性分业对诸子均分精神的坚持 / 212

第二节 关于徽州典商继承父辈典当资本的方式

——立足于《乾隆十六年黄炽等立阉分合同》的观察 / 213

一、《乾隆十六年黄炽等立阉分合同》中有关典当资本继承、析分方面的内容 / 214

二、《阉分合同》反映出的黄氏典当铺的资本规模与资本增值状况 / 217

三、黄炽兄弟对父辈典当资本的继承与析分 / 220

第三节 略述徽典资本传承方式对徽商发展的意义 / 224

一、徽典在资本传授上的严谨性所昭示的意义 / 224

二、徽典资本继承方式的寓意：资本析分与保持资本经营规模并不矛盾 / 226

结 语 / 228

参考文献 / 230

后记 / 265

绪 论

15—18 世纪,即明清三百年间,地域性商人群体——商帮——的活动令人瞩目。当时的商业经营者经常以群体的力量活跃在商业舞台和社会生活领域,商业竞争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商人群体之间的竞争。在众多的商帮中,徽商堪称一执牛耳者,其以资本雄厚、势力庞大、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善于投靠官府而著称于世。在徽商经营诸业中,典当业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徽商的四大主业之一。典当业,是一种传统的金融行业,它以质押借贷为特色,而明清时代正是中国传统典当业发展的繁盛阶段。对于徽州典当商人的活动,虽然长期以来学界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成果大多是散见于报刊论著之中,尚缺乏作系统分析的专题性著作。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笔者试图立足于徽州商人的地域性特点和典当业的行业特点,在学习、借鉴前人研究方法、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转换分析思路,对有关资料作进一步的爬梳整理,展开系统分析,期望能有所突破。

以下兹就在这个问题前人的有关研究情况,以及本书在讨论时的基本框架先略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徽州典商研究回顾

关于徽州典当商人,是一个徽商研究和我国典当史研究相交叉的课题。有鉴于此,对于前人已有研究的回顾,也需要分别从这两大领域来进行。大体来看,在前一领域,人们从关注徽商整体开始,逐步发展到关注徽商的具体组成部分,典商即是其中之一。在另一领域,前人则是从近代中国典当业所面临的问题入手,渐次过渡到梳理此前典当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而明清时代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从徽商到徽州典商的研究回顾

学术界关注徽商,大约始于 20 世纪的 40 年代后期。徽商研究的第一人和奠基者是傅衣凌先生。1947 年傅先生发表《明代徽商考》一文,对徽人从事商业的时间、徽商的富名、徽商经营的领域、活动的地点、徽商资本的出路,以及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其后,该文更名为《明代徽州商人》后收入傅先生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详见书后参考文献,下同。)一书中。在国内,比傅衣凌先生晚一些,至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徽商问题的学者,还有曹觉生(1957)、陈学文(1958)、秦佩珩(1958)、杨德泉(1962)等。其中,陈学文先生以陈野的笔名撰写的《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阐述了徽州商业资本形成的条件、背景,徽州商业资本的特色、作用,以及从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堪称一时之力作。

在国外,日本学者藤井宏于 1953 年、1954 年发表了徽商研究的长篇巨作《新安商人研究》,该文以明汪道昆的《太函集》为主要资料,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

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这是海外学者徽商研究的拓荒之作。继他之后,重田德(1967)也曾撰文,着力于分析清代后期徽商的活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徽商研究迎来了它迅速发展的时期。1983年叶显恩先生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对徽州的历史地理、徽州人的由来、徽州历史上人口与土地的变动、明清时期徽州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商业资本、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封建文化、佃仆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这是迄今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权威著作之一。与此同时,在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以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这是国内外成立最早的徽商研究团体。此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至21世纪初,国内研究徽商的人员已达一二百人,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20年来,先后出版的徽商研究的著作就不下二十余部,如《徽商研究》(张海鹏、王廷元,1995)、《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王振忠,1996)、《徽商与经营文化》(周晓光、李琳琦,1998)等。其中《徽商研究》一书系统论述了徽商的兴衰历史,被认为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范金民语)。此外,一些综论古代商人和区域经济的著作,如《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黄明达,1993)、《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唐力行,1999)、《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范金民,1998)、《两驿集》(赵华富,1999)等著作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徽商。那些以徽商为题的论文,仅粗略统计,仅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不下五百余篇。

通常认为,徽商经营以盐、典、茶、木为四大项,徽州典商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总体性的徽商研究往往会涉及徽商经营典当的问题,即使不是作这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以一定的笔墨来加以论述的情况也不少见。当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那些专论徽典的作品,比如:《徽州典商述论》(王廷元,1986)、《明末典业徽商一例:〈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研究》(栾成显,1996)、《明清徽

州典商的盛衰》(王世华,1999)、《明清徽州典商述略》(范金民、夏维中,2002)、《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影响——以长江三角洲的苏州等地为中心》(徐玲,2004)、《徽州典当资本的增值:以程虚宇家族为例》(汪崇笈,2004)、《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王振忠,2004)、《〈乾隆十六年黄炽等立阉分合同〉所见徽商典当资本研究》(郑小娟,2007)、《“蓄水”、“反哺”和“信息终端”——略论徽典对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三个基本功能》(郑小娟,2009),等等。

2. 从我国近代典当业到典当发展史的研究回顾

有关国内典当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时由于受到新兴金融势力的冲击,典当业已出现了全国性的衰退,所以人们开始关注这一行业,寻找其衰落的原因,探讨如何采取扶助措施,以达到重振和改良典当业的目的。这个时期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研究著作,即杨肇遇的《中国典当业》(1929)和宓公干的《典当论》(1936)。杨氏之著虽然篇幅不长,但被认为是开创了对国内典当业进行全面研究的先河,其书分概说、种类、组织、设备、营业、管理、票簿、书体、待遇和当税十章,对典当业所涉及的有关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介绍。宓氏之书则是在杨氏的基础上扩充了介绍范围,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搜集了更多资料,不仅对全国的典当行业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而且对比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典当业运营情况,对我国典当业的改造和复兴提出了不少建议。当时也有关于某一区域典当业的研究著作,如《广东典当业》(区季鸾,1934)、《北京典当业之概况》(北京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1940)等。在这一时期,有关分析典当行业的现状,提供政策建议的文章是比较多的,在不少杂志和报刊上都可以看到,如《典当业及其改善方案》(刘仲谦,1933)、《农村高利贷与典当业》(吴晓晨,1934)、《中国典当业之研究》(郭荣生,1934)、《中国典当业资本之分析》(陆国香,1936)等等。不过,整个二三十年代,有关典当业的研究深度实际上是比较浅的,这正如刘秋

根先生(1992)指出的,这个时期的研究有这样两个特点:“一、集中于当时的典当,对典当业的历史沿革则研究不够;二、集中于对典当业本身的制度及其状况的调查、研究,对它在整个金融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则研究得还不够。”

从20年代到70年代,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上趋于沉寂。7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典当业的历史发展问题。先有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发表《清代に於ける典當業の趨勢》(1971)一文,就清代的官私典当问题展开研究,后有香港的罗炳锦,先后发表了《清代以来典当业的管制及其衰落》(1977)、《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1978)、《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类别捐税》(1978)等文,对清代以来典当业的演变趋势及民国时期的典当业进行了探讨,但总的来看,整个7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还是寥寥,在中国内地更显冷清。80年代以后,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开始发力。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中国内地中断了三十多年的典当业又重新进入经济生活领域,且有不断发展壮大之势,已彰显了它在社会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挖掘、整理过去传统时代典当业运作的史实,以为今天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成为摆在研究者议事日程上的一个课题。基于这种需求,从80年代以后,专论中国历史上典当问题的作品就在不断推出。由于明清以前关于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比较少,而明清以后则多了起来,而且,在事实上,明清时代正是中国传统典当业发展的高峰——这数百年间,典当业空前繁荣,成为地主、富商、官绅乃至官府、皇室投资取利的热点——它不仅与人们的生活消费密切相关,而且已渗入到当时社会的多个层面,与国家经济、官僚政治、思想文化、习俗风尚、社会局面等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迄今有关典当业发展史研究的重点自然就放在了明清乃至近代。到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展开较多工作的学者有韦庆远、曲彦斌和刘秋根等。韦先生在80年代中后期,利用内务府奏销档,对清代官营典当的起源、资本、用途和经营管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论清代“皇当”》《论清代

“生息银两”与官府经营的典当业》等八篇文章,均收入其个人论文集《明清史辨析》(1989)中。曲先生著有《典当史》(1993)、《中国典当》(1994)、《中国典当学》(2002)。刘先生著有《中国典当制度史》(1995)、《明清高利贷资本》(2000)。专论明清乃至近代典当业的论文,也有不少,比如《从档案史料的记载看清代典当业》(宋秀元,1985)、《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37)》(潘敏德,1985)、《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及作用》(果鸿孝,1989)、《明代典当业初探》(王海燕,1998)、《明清典当和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与乡村社会的稳定》(卞利,2005)、《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杨勇,2005)、《论明清典当业兴盛之原因》(郑小娟,2009)等等。

二、本书的基本框架

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经验的基础上,本书设计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大体上,基本思路是:徽商——徽典——徽商。即先立足于明清时期的徽商总体来分析其中的徽典这一类型,然后再来分析徽典的存在、发展对于徽商集团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由此,有关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六个部分:

第一章,关于徽商兴起的原因。古徽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应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里农耕环境恶劣,由地域闭塞和移民迁入带来的日益失调的人地比例,以及徽州当地的特产资源和区位优势,都是促使徽州人走上从商道路的重要动因。而徽州的社会人文条件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由于汉越融合造就了新质徽州人和“贾儒相通”思想的提出上。在各方面因素的促成下,至明中叶时,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帮逐渐形成。在徽商形成和发展起来以后,典当业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业务,号称是徽商从事的四大行业之一。而能够发展到后来这个程度,表明徽州人必有热衷于治典的思想倾向。本书强调,是徽州本土的“寄命于钱”的生活方式促使徽州人热衷于经营货币借贷业,典当业质押借贷的特点又使

之适合于流寓四方的徽州人经营,加上明中叶时日益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为徽典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徽州人亦抓住了明代经营典当业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迅速发展成为明清典当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章,阐释徽商在典当经营业上的成功。徽州人能够在明清典当经营业中称雄,应源自于徽州社会素以严密著称的宗族关系网络的支持。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宗族关系,徽典能够获得资金和人力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徽典在不少地方建立区域性行业垄断;有宗族关系相联结,身处异地的徽典可以合力抗拒地方恶势力的侵扰。由此,徽典繁盛已为世人所习见。但同时期亦有以擅长业典而知名的山陕商人,尤其是晋商,其资本雄厚不亚于徽商,如何看待徽州人在明清典当业中称雄的问题,需要一个慎重的回答。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人笔下徽典的这种繁盛是否掺杂“水分”,也需要有所澄清。而透过徽典发展的盛况,还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成功徽典的经营方式中,是否有符合现代典当业发展方向之处?这有助于今人进一步阐释徽典繁盛的意义。

第三章,徽州典商例说。以事实而论,徽州典商并不只是一个书面的文字符号,而更应看做由一个个活生生个体组成的类型,因有着经营典当业的共性,所以被归入同一类型,但这一类型中人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在总体把握这一类型的基础上,亦需深入到个体。这一部分试图通过对照、分析众多徽典事迹,来勾画一幅颇具代表意义的“徽州典商众生相”。而分析结果显示,所谓“徽州典商”往往只是这些徽州商人众多身份中的一重,“徽州典商”的实际意义更多的是表现在概念上,在很多时候毋宁说它是徽商的一个侧面。因此,关于明清时期徽州典当商人这个论题,它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有典当业本身的,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典当业在徽商经营诸业中的定位问题。这一点落实到行为主体,就是典商对于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问题。

第四章,静态分析。考察典商对于徽州商帮发展所起的作用,观